

李自成

張獻忠

胡允恭 著

反義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胡允恭 著

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胡允恭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台印刷厂印刷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40,000

印数 1—3500

统一书号：11336·008 定价：1.20元

责任编辑：陆西骋

00001

自序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阶级斗争。国内外学者对明末农民战争史，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写出了论文和专著，也编辑过专题史料。这些辛勤的学术工作，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明末农民战争史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军事史，而是与明末社会政治史、经济史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必须考虑到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在我的这本著作里，注意到以下一些问题。

明末农民战争发生在十七世纪，带有时代的特点。要对这些特点作出具体分析，不但要弄清农民军一方，还要了解明王朝一方，又要注意到后金（清）一方，研究这三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消长。

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在斗争的高潮中，因势利导，分别建立政权机构。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的权力，是掌握在农民军领袖手中的，是适应农民军胜利进军的需要。学术界对民政权有不同见解，应当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加以讨论。明末民政权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农民战争经验的积累。

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支农民军，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坚持十六、七年的战斗？他们带领的几十万人马（包括随军家属）是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的？如果这两支农民军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给养的困难，也就不可能保全自己的有生力量，持久地与明军作战，最后粉碎了崇祯王朝。

当清军入关，农民战争转入低潮之后，李自成究竟是壮烈牺牲在九宫山，还是在困难时刻逃避斗争，削发为僧？这些问题关系对这一英雄人物的历史评价。

以上不过是举例说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我对明末清初的历史感到兴趣，就时间上说已经很久。三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地读一些史籍，做了一些札记。本书就是我的读书心得，目的是想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战斗一生，从起义开始，逐步发展壮大，到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全过程，理出一个头绪，作一简明的论述，略抒一管之见。由于年事已高，精力日衰，所论未必准确，尚有待于学者们的教正。

本书撰写过程中，承历史所洪煥椿教授协助查核文献，并亲自参加校对，做了大量工作，使本书得以在较快的时间内出版，在此表示谢意。

胡允恭

一九八五年冬于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

时年八十有四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明末陕西社会和农民起义	(1)
一、腐朽瘫痪的明末政权.....	(1)
二、疮痍满目的陕西社会.....	(5)
三、陕北饥民遍地起义.....	(9)
第二章 农民军入晋和初期战斗的发展.....	(19)
一、农民军进入山西后的战斗.....	(19)
二、明军在陕西的大屠杀.....	(26)
三、农民军实力的壮大和山西反围剿的胜利…	(32)
第三章 农民军转守为攻和分头进军.....	(41)
一、河南的围剿和反围剿战斗.....	(41)
二、农民军进入湖广鄖襄地区.....	(44)
三、秦晋豫地区的运动战和荥阳之会.....	(49)
四、攻下凤阳和分头进军.....	(57)

第四章 农民军的犀利攻势和明军

陷入两面应战 (74)

一、农民军向长江北岸和四川胜利进军 (74)

二、清军的进逼和明军被迫两面应战 (88)

三、明王朝内部矛盾的激化 (98)

第五章 张献忠军入蜀和明军主力

的被歼灭 (101)

一、张献忠部第三次入蜀 (101)

二、杨嗣昌的战略部署 (105)

三、明朝军事主力的瓦解和张献忠攻陷襄阳 (109)

第六章 李自成军攻陷洛阳和明军

在辽西的惨败 (121)

一、李自成大军的迅速成长 (121)

二、攻克洛阳和明王朝陷入绝境 (124)

三、清军进攻辽西和洪承畴的败降 (129)

第七章 李自成和张献忠两军发动

全面攻势 (137)

一、国内战争形势的急速变化 (137)

二、李自成军大战中原和统一湖广 (142)

三、张献忠大军活跃在长江北岸 (150)

第八章 农民政权的建立和闯王进京	(154)
一、李自成军建立大顺农民政权	(154)
二、张献忠军建立大西农民政权	(163)
三、李自成大军攻克明朝首都的辉煌胜利	(169)
第九章 清军入关和农民军转向抗清斗争	(181)
一、清军入关后李自成军的败退	(181)
二、张献忠在四川的战斗及其失败	(188)
三、李自成张献忠余部转入艰苦的抗清斗争	(193)

第一章

明末陕西社会和农民起义

一、腐朽瘫痪的明末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明朝经历了由盛而衰、由治而乱的过程。从嘉靖到万历时期，明朝国家政治的腐败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日渐加深，下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十七世纪的天启、崇祯时代，国家政权四分五裂，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入衰败的境地。

从政治方面来看，万历以后的国君，一代不如一代。到天启、崇祯两朝，国家政治已经败坏到不堪收拾的地步。明神宗朱翊钧，中年以后便不问政治，数十年不见大臣。但他却费尽心机，向全国各地横征暴敛，搜刮民财。设置矿监税使，就是万历时期的一大虐政。

万历二十四年（1596）以后，朱翊钧听信宦官的诱惑，任命大批太监充任矿税监，威胁各地督抚和州县官为之出力；又设立官署、关卡，招收一大群无赖游民作为爪牙，敲榨勒索，甚至一鸡一鸭也得收税。州县官吏自好者，敢怒而不敢言；贪婪者则附和矿监税使，上下其手。数年之间，闹得

全国工商凋敝，民怨沸腾。户部给事中包见捷、左春坊庶子叶向高（1559—1617）等正直刚毅的官员，纷纷上书揭发宦官罪恶，其中以凤阳巡抚李三才（？—1623）的疏文最为激烈，开头便写道：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税得银若干，明日某税加银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惟利是图。……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勒诈，动以万数。……刘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墓，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爱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明史纪事本末》卷5，矿税之弊）

一群上疏抗争的官员，或遭撤职、逮捕，或下诏狱、处死。于是，矿税监更加恣意横行，无恶不作。

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万历三十四年（1606），自云南到东北，爆发了城市大暴乱，市民斗争使全国城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反矿税监的余波，连年不息。乱后的社会，呈现出极度凄惨的景象。在农村，大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未曾停止。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童宾登上皇位，不知什么是政权。熹宗的实权被宦官魏忠贤所窃夺。

魏阉是个目不识丁、善于逢迎的滑贼。他骗取皇帝的信

任，夺得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重要地位，并扩充东厂、西厂，自任厂臣，把这些侦察机构变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厂臣便成了掌握实权的皇帝。无耻官僚，都争先恐后投靠魏阉门下，充当爪牙。以兵部尚书崔呈秀、大学士魏广微、礼部尚书顾秉谦为首，下至阮大铖等，以及全国各地督抚多人，党羽共有二百六十余。结果，魏忠贤的生祠遍天下，而全国人民却被推到死亡的边缘，求生不得，饿殍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政治的败坏，使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无法得到改善。贫苦的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一九五七年，在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一块《荒年志》碑。碑文记载崇祯十二年至十七年（1639—1644）河南地区人民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一副悲惨的情景！

碑文记载道：

一记崇祯十二年春，旱风相仍，麦减收。至六月，大旱，蝗虫遍残，五谷减收。至冬月，不降片雪。此虽荒年，而人未死。

一记十三年春，红风大作，麦死无遗。□家□食野菜树皮，受饿者面身黄肿，生瘟病死者有半。至五月二十二日方雨。棉花、高粱、谷、豆，一时播种。至六月三伏无雨，旱蝗残食，五谷不收。至八月二十四日降霜，荞麦不收。当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民流为盗，蜂拥蚁聚，无不被害之家。穷者饿极，凡遇死人，争割肉以充腹，甚至活人亦杀而食。垣颓屋破，野烟空锁；子母分离，赤地千里，诚可怜也。

一记十四年春，红风又作，麦死无遗，乱扰不息，幸有大兵，至正月二十日，遍行剿除，良民始安。至五月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卖地

为食者，每亩价止三百文。惟物类大贵，斗米价值一千七百文，高粱价九百文，豆价一千五百文，独荞麦惟正当种时，每斗价三千五百文，牛犋每支三十千。

一记十五年，田禾微收，黎民小康。惟有棉花、牛畜大贵，子花每斤价二百四十文，牛大者价七十千，小者四十千，更有银每两换钱二千文，猪肉每斤钱二百五十文。至冬十一月，鞑兵遍至，杀人民、官军甚多。

一记十六年，鞑兵重至，我中国自此大乱。至十七年，闯王获京都，逼死崇祯，府县建官，国号大顺。后，大明会合鞑兵恢复。时土贼攻破黄池，抢掠乡村。及鞑王摄政，国号大清，改为顺治元年，土贼稍平。特志。（载《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

根据《明史》本纪记载，当时饥荒是十分严重的，崇祯九年（1636），南阳旱灾，民大饥；崇祯十年（1637），河南蝗灾，民大饥；崇祯十一年（1638），河南大旱，蝗灾；崇祯十二年（1639），河南旱，蝗灾；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旱，蝗灾；崇祯十四年（1641），河南旱，蝗灾。以上碑文与《明史》的记载是一致的。在无年不受灾的情况下，五谷不收，粮价高涨，子母分离，赤地千里。

从经济方面来看，明末的社会经济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地步。马克思早就研究过亚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并作出如下的结论：“在亚洲各国，农业通常是在一个政府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这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卷1，页325）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基本理论。元末农业萎缩，经历了一场红巾军大起义；明初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洪武、永乐时期的盛世。明末国家政治腐败，农业破

产，农民被迫举行起义。只有经过农民起义，冲击旧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旧制度，才有可能使农业生产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明代流民问题的严重化，原因是全国社会经济的破坏，大片土地都成为皇庄、官庄和勋戚庄田，“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解，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明史》卷77，食货一）大批贫农或投靠豪门，充当农奴；或窜入深山，开荒自救；或举家舟居，捞渔糊口；或四处流徙，沿门托钵。

农业的破坏，使农村家庭副业、手工业陷入绝境，城市商业受到极大的摧残。

农、工、商业的凋敝，直接影响国家财政税收的大幅度下降。每年财政开支无法维持，使国家濒于崩溃的局面。明末九边防务，全部废弛，京营禁军，形同乞丐，衣烂鞋破。老兵不能披甲执戈，少者不能弯弓发矢。

人民失去了生活的源泉，阶级矛盾必然要日夜激化。

二、疮痍满目的陕西社会

天启七年（1627），熹宗朱由校死，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以次年为崇祯元年（1628）。

朱由检是由校的弟弟，同为光宗朱常洛之子，神宗朱翊钧之孙。他初封信王，母刘妃早逝，又出居外邸，略通世事，继位时年仅十七岁。年轻的皇帝颇为自负，希望能恢复他的祖宗残业。但是，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于内外矛盾的交

困之中。

内部：熹宗朱由校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权力在魏忠贤手中。如果处理不善，魏党有乘机骚乱的可能。五府、六部和地方督抚等封疆大吏，大多投靠在魏忠贤门下。他们荣辱与共，勾结已久。在满朝文武官员中，朱由检处于孤立的地位。

外部：全国动乱不安，饥民成群，流离失所；天灾流行，连年不止。天启七年（1627），陕北已经发生王二领导的农民起义，官府无力对付。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后来，崇祯皇帝总算觅得老成练达的东林党人韩爌（1564—1644）为内阁首辅。在韩爌和东林党人的协助下，着手解决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清除了魏忠贤及其主要帮凶崔呈秀等。魏阉一死，树倒猢狲散，才把投靠魏阉的无耻大臣顾秉谦、魏广微之流，或革职，或逮捕。但其余孽，仍有很多人漏网，日后仍然趁机兴风作浪。

但是，朱由检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物，真正有才能的官员不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韩爌被罢官，东林党人纷纷离开了朝廷。因此矛盾不但不能得到解决，天灾人祸愈演愈烈。陕西成为当时矛盾最集中的地区。

从天启末年以后，陕西的灾荒连接发生，广大农民处于饥饿之中，人心惶惶。崇祯初，陕西各种灾害纷至沓来，势如洪水。一位年青进士马懋才奉差外出，于崇祯二年上疏报告沿途见闻。内容翔实逼真。疏中写道：

臣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领诏，奔驰四载，往还

数万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臣见诸臣具疏，有言父弃其子，夫鬻其妻者；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者，犹未详言也。臣今悉为皇上言之：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削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蓄者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毫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饿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上面是陕西天灾的写真。马懋才接着又写道：

最可悯者，延安府安塞城西粪场一处，每日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土者。至次晨所弃婴儿，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埋骸骨。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之外，有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明季北略》卷5，《备陈大饥疏》）

这是对饥民饿死、冻死，遍地死尸和人食人等惨状的写真。

不仅延安一府一县天灾严重，整个陕西，几乎是遍地灾荒。据延安、米脂、澄城等府县地方志记载：

崇祯元年（1628）全陕旱灾、霜灾，北部尤为严重，人食蓬蒿。

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

三年，全陕旱灾，米脂县夏、秋无收获。

四年，旱灾地区北起榆林，南至延安。

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民死亡过半。

天灾而外，陕西还有人祸。

一、明户部侍郎南居益于崇祯二年（1629）《请发军饷疏》称：“九道要害半在关中，故刍饷之需，独倍他省。迩因宇内多事，司农告匮，延绥宁固三镇，粮额缺至三十六月矣。去岁全省灾荒，室若悬磬，野无青草。边方斗米贵至四钱，军民交困，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穷极思乱，大盗蜂起……。请先发给积逋之饷。饷如不足，士不宿饱，马无余刍，枵腹荷戈，即慈父不能保其子，而抚镇又安能制此汹汹骄悍之卒哉？”（《明季北略》卷1）

二、兵部左给事中刘懋《请裁驿递疏》称：“国用不足，务在多方节省。秦晋驿递，年费数十万，请予裁去，以充国用。”（同上）

朱由检对南居益请发三边（延绥、固原、宁夏）驻军三年欠饷，不予批答；对刘懋请裁驿递，则即刻批准，通令从速执行。

九边防务是朱元璋和朱棣精心筹划的。每镇兵额多少，薪饷多少，都有成文规定，不准拖欠克扣。据魏焕《皇明九边考》记载，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延数千里，设置

。九镇各镇所辖地区和城堡数字，都有明确规定。各镇间的联系，密如蛛网。九镇以西北四镇延绥镇、固原镇、宁夏镇、甘肃镇为重点。欠饷三年之久，必然要导致兵变。

秦晋驿递，设置已久。这一带千有余里，崇山峻岭，交通梗塞，行旅不便，影响军事运输。置驿以后，由于长期经营，完成一条通道。每站有管理官员，备有车马驿夫。据正德《大同府志》记载，每站马三十五匹，马夫十七人，人马月支银一两。明代驿站人夫达到数千名。裁驿不但不利于西北交通，使一大批站夫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被迫爆发兵变，驿马变成了战马，纷纷加入农民起义队伍。

明末农民大起义首次发难于陕西，决不是偶然的。

三、陕北饥民遍地起义

没有农民革命的形势，就不可能发生明末农民大起义，而且在时间上延续达十七年之久。

列宁曾经说过：“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先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